

音义训诂之学的兴盛与晋宋文风变革

杨思思

【摘要】语言风貌的转变是晋宋之际文学变革的一个重要层面。东晋后期以来的学风呈现出重视音义训诂的特征,小学与文学发生了密切互动,具体表现在集部注释重视音义训诂以及文士参与小学书撰作两个维度。音义训诂之学的兴盛深化了文士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影响了文士对文学传统的接受以及诗赋文章的创作,为晋宋之际的文学变革提供了语言文字层面的路径。谢灵运“贯练雅颂,总阅音义”的用字集中展现了音义训诂之学对经典接受与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音义;训诂;小学;谢灵运;语言风貌

【作者简介】杨思思,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24.4.182~189

胡应麟《诗薮》以晋宋之交为“古今诗道升降之大限”^①。对于晋宋之际的文学变革来说,语言风貌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层面。东晋文坛“玄风独振”^②,玄学语言观以语言为得意的工具。整体来看,东晋诗文写作并不措意于语言文字层面的锻炼,正如齐梁的批评家所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③，“遁丽之辞,无闻焉尔”^④。刘宋以来的南朝文学则不然,发展出了“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⑤的迥异特征。

语言文字层面的新变是南朝文学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路径。前人关于晋宋之际文学语言风貌变化的论述纷繁多歧,但归结起来,大致不出巧切、新奇、典丽、俳偶几个方面。这些特征或为语言风格,或重修辞方式,但根本上都是通过“选词”“用字”来达成的。正如刘勰所说,“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⑥,如何选词用字,是结撰文章时最基本的考虑。通过选词用字来考察晋宋之际文学语言风貌的转变,可以将“小学”与“文学”自然榫接。“小学”以文字为中心,对文字音、形、义的认识与理解,影响着文士“用字”时的考量,通过“用字”这一环,小学知识对

文学的整体风貌发挥着基础性的影响。此前学界关于小学与南朝文学新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韵学与永明新体的问题上,然而南朝文学对语言文字的重视不是到永明年间(483-493年)才骤然开始的,也不是只关注声律一个层面。本文试图聚焦晋宋之际这一南朝文学的“前史”时段,考察这一时期音义训诂之学^⑦的繁荣及其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并以“用字”为切入点,分析音义训诂之学如何深化了文士对语言文字的认识,进而影响他们对文学传统的接受以及诗赋文章的创作风貌。

一、东晋后期音义训诂之学的兴盛

唐长孺先生考察南北学风的差异,指出东晋经学因受玄学影响,特重义解,与重视名物训诂的北学不同。^⑧但就东晋一代来说,从诸家《补晋书艺文志》的著录来看,东晋后期^⑨的学风也同样表现出了重视音义训诂的特征。

古书注释有“音义”一类,“所谓音指辨音,所谓义指释义,两者相合称为音义。音义又称为音。”^⑩音义依附于经典,从诸家《补晋书艺文志》来看,音义类注释自过江之初的郭璞、李轨之后,鲜见于录,而东

晋后期,以徐邈、徐广兄弟为代表,音义类注释大量涌现。经书音义,如徐邈有《五经音》十卷^①(《五经音》又可单本别行,《隋志》另有徐邈《周易音》一卷、《古文尚书音》一卷、《毛诗音》二卷、《礼记音》三卷、《春秋左氏传音》三卷,这五种加总之后正是十卷)、《论语音》二卷,徐广有《毛诗背隐义》二卷,^②袁悦之又有《易音》^③。史书音义,如徐广《史记音义》十二卷;诸子音义,如徐邈《庄子音》三卷、《庄子集音》三卷,^④戴逵《老子音》一卷;集部亦有徐邈《楚辞音》一卷。可以看出,通过辨音释义进行经典文本研习和传授的学术风气在东晋后期蔚为大观。

音义本是为了疏通经典,东晋后期重视文字音义训诂的时代学风实与东晋孝武帝朝的崇儒政策相关。胡宝国指出,孝武帝朝统治局面较为稳定,在学术文化方面颇有作为,做出了不少兴复儒学的举措。^⑤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⑥,谢安等人十分重视,曾预先私庭讲习,^⑦为一时盛事。太元元年又兴复国子学,普修乡校。^⑧此外,太元中还曾大规模征集图书。^⑨这些举措都需要相应的人才,太元中因儒术进用者颇多,如臧焘“少好学,善三礼”,因国子学建立被谢玄举为国子助教;^⑩车胤因太学生增置百人而领国子博士;^⑪徐广总领校书,“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增置职僚”^⑫。此外,东晋大儒范宁、孔安国,都在孝武帝朝得到任用。

这一时期大量进用的“儒素”,学术好尚原本就与聚集在建康的一流高门不同,往往重经术而轻玄谈。^⑬孝武帝朝崇儒兴学、重用儒生的举措对当时学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徐邈、徐广兄弟在建康的学术活动就是显例。《晋书》叙徐邈进用:

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

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迁散骑常侍,犹处西省,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⑭

所谓“撰正五经音训”,指的应该就是为五经作音义,即其《五经音》十卷。徐邈所作音义在南朝的学术传统中影响颇深,颜之推称梁时“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⑮,在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徐邈音注也是最重要的来源。^⑯结合《晋书》将徐邈“撰正五经音训”之事置于“在西省侍帝”“前后十年”的经历中叙说,他所作音义恐怕也是迎合在上者崇儒之意的。此外,徐邈之弟徐广所作《史记音义》,以文字校勘为基础工作,裴骃称其“研核众本”,“具列异同,兼述训解”^⑰,这应该与他当时校书秘阁的职任密切相关。徐邈、徐广得以从“下帷读书,不游城邑”^⑱的“东州儒素”一跃成为在建康具有影响力的当代学术的核心人物,除了二人本身的学术造诣之外,也离不开孝武帝朝宠待儒生、弘扬儒学的特殊机遇。

东晋后期重视音义训诂之风的另一表征是小学之书的撰作。音义类注释与小学书关系密切。二者在内容上有共性,都涉及对文字音、形、义的讨论,但音义的训释受到具体语境的影响,而小学之书相对独立。在中古目录书中,音义类注释附于经典之下,而小学之书单独成类。不过,音义类注释与小学类著述又可以互相引据、转化。晋宋之际撰作的小学书以训诂为主^⑲,如殷仲堪有《常用字训》一卷,何承天有《纂文》三卷,^⑳颜延之有《纂要》^㉑和《诂幼》^㉒。东晋后期的音义类注释与小学书,共同诞生于重视文字音义训诂的时代学风之中。

二、音义训诂之学与文学的互动

小学自古与文章关系不浅。汉代赋家大多兼善小学,如司马相如有《凡将篇》、扬雄有《训纂篇》,都

是汇纂字词编为韵文的小学书。大赋写作“多赋京苑，假借形声”^③，必以对文字音、形、义的熟稔为基础，即刘勰所谓“前汉小学，率多玮字”^④，“鸿笔之徒，莫不洞晓”^⑤。然而魏晋以来，小学与文学的主体渐分，文士对小学知识渐趋淡漠，小学成就似未运化于心。文士“小学转疏”^⑥，影响了魏晋以来的文学阅读与文学创作。在阅读方面，文士对前代文学传统相对隔膜，“追观汉作，翻成阻奥”^⑦，正如曹植所说，“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⑧；在创作方面，用字平易，范围缩小，曹魏以来便“字有常检”^⑨，“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⑩。魏晋文学的语言风貌也转为“浅而绮”，刘师培认为文风之“浅”就与“用字平易，不事艰深”有关。^⑪

晋宋之际，小学与文学发生了密切互动，这在当时的著述中班班可验。一方面，小学施用于文学，诗赋文章出现了一批音义类注释；另一方面，文士参与了小学书的撰作，影响了一批小学书的旨趣。

诗赋文章的音义类注释，有助于文士对前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接受。晋宋之际的文学变革与文学复古关系密切，^⑫这一时期的诗文有拟古、学古的风气。学古需要博观前代作品，离章辨句，剖析文辞。音义训诂之学有助于为文士的“学古”疏通文本，为文学复古的潮流提供了重要辅助。徐邈《楚辞音》的撰作即是一例。《楚辞》因其“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⑬，对读者来说有一定的门槛。诵读《楚辞》也是一项专门学问。^⑭《楚辞》旧注有东汉王逸以及东晋初期郭璞二家。王逸注的内容主要是章句疏通，部分篇章有字词训诂，还有一些篇章只有韵语式的大意串讲。郭璞注已经散佚，胡小石根据敦煌《楚辞音》残卷所引三条郭璞注，认为“似其注诠释义旨者，体例亦与王氏章句不甚相远。”^⑮王逸《章句》并不注音，释义也不全面，《楚辞》读诵难以从纸面上承传。徐邈音义的出现，可以从字词、音声上为时人诵

读《楚辞》扫清障碍，即使是识字水平较低、缺乏师傅教导的群体也可以执卷而读，有助于扩大《楚辞》传播的范围。

晋宋之际的赋注也呈现出重视音义训诂的特色。刘宋褚诠之所撰《百赋音》十卷，采用的就是音义体。^⑯《颜氏家训》称“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⑰，侧面反映出《百赋音》为赋作诵读提供了便利，一度广泛流行。刘宋时期的赋注，流传至今的有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与徐爰《射雉赋》注。这两家注释虽非音义体，但都重视音义训诂。谢灵运《山居赋》中写鱼、鸟、兽、草、木、竹的几段，博列名物，连类而出。如果把谢灵运的自注与题为刘逵的《蜀都赋》《吴都赋》旧注相比，很容易就能看出谢灵运自注的特点：

《吴都赋》：鸟则鸚鷓鷃鷓，鷓鷃鷓鷃，鷓鷃避风，候雁造江。

刘逵注曰：鷓鷃，水鸟也。如鷓而大，长颈，赤目，其毛辟水毒。丹阳、鄱阳皆有之。鷓鷃，鸟也。似凤。《左传》曰：海鸟爰居，止鲁东门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不知其鸟，以为神也。^⑱

《山居赋》：鸟则鷓鷃鷓鷃，鷓鷃鷓鷃。鸡鹊绣质，鷓鷃绶章。

谢灵运自注：鷓音昆。鷓音洪。鷓音溢。《左传》云：“六鷓退飞”，字如此。鷓音下竺反。鷓音秋。鷓音路。鷓音保。鷓音相。唐公之马，与此鸟色同，故谓为鷓，音相。鸡鹊鷓鷃，见张茂先《博物志》。鷓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鸟并美采质。^⑲

刘逵注重在名物，往往交代名物出产之地，辨析彼此间性状的差异。而谢灵运的注释重在文字，或是注音，或是用字出处的简略交代，名物本身的细节相对混沌。

此外，徐爰为西晋潘岳《射雉赋》所作之注，注文杂采传注训诂，又明引《尔雅》《方言》《三苍》《埤苍》

诸家,赋中异字难字也多有注音。徐爰注中有一处对颜延之意见的反驳,从中可以管窥晋宋之际文士研读中朝诗赋时考按字句、剖判训诂的一般风气。颜延之认为潘岳“雉鷩鷩而朝鴈”^⑤一句用字有误,这大概是根据《诗经》毛传和《说文》训释,“鷩鷩”用于雌雉,“雩”用于雄雉,一句之中混杂雌雄,自相矛盾。徐爰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只是“互文以举,雄雌皆鸣也。”^⑥引证故训、分析字词训诂的做法,过去一般见于对经史的注释和讨论之中。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生动具体地看出这一时期文学阅读中小学知识的深度参与。

晋宋之际的小学书,撰作者大都是当时的能文之士。这些小学书或为初学发蒙之用,或有博闻多识之效,在文字音、形、义方面的分析并不专深,但从内容体例上都可以反映出文士的趣味。如何承天《纂文》,沈约称此书“奇博”,不仅是从收字来说,也与它引据广博的特点有关,沈约就曾向刘杳问及书中记载的张仲师与长颈王之事。^⑦事类引据是“诗赋所须”,《纂文》已变前代小学书“全无引据,过伤浅局”之旧貌。^⑧

在这一时期的诸种小学书中,颜延之《纂要》值得注意。《纂要》以字词训诂为主,却带有类书色彩,^⑨反映出诗文创中俳偶、典丽的追求对小学书编纂方式的影响。《隋书·经籍志》将此书著录在子部杂家类,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在经部小学类,归于“《尔雅》《广雅》十八家”^⑩中。《纂要》归类上的分歧正在于它性质上的两面性:体例上按义类编排、分类训释名物,是《尔雅》系辞书的延续;每一类目下杂抄词语的范围增广,意义辨析更为细密,已近于《初学记》每目中的“叙事”部分。

《纂要》按义类编纂词汇,与相关题材的诗赋写作可以互参。如《初学记》所引^⑪关于“雨”一类的条目:

《纂要》云:疾雨曰骤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霁。雨而昼晴曰启。雨水曰潦。雨云曰涂。梅熟而雨曰梅雨。雨师曰屏翳。亦曰屏号。(徐坚:《初学记》卷二“天部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23页)

这组词汇连类相及,不少都见于西晋以来的苦雨诗赋,如傅玄“霖雨如倒井,黄潦起洪波”(《雨诗》^⑫),江淹“有_有_有兴_有春_有节,愁_有霖_有贯_有秋_有序”(《杂体诗·张黄门协苦雨》),用词都在这个意义范围之内。又如《纂要》中关于天地宇宙、山岳江河、政体人事的综合概念,其中不少是“以数为纪”^⑬的合成词:

《纂要》云:东西南北曰四方。四方之隅曰四维。天地四方曰六合。天地曰二仪。以人参之曰三才。……日月谓之两曜。五星谓之五纬。日月星谓之三辰。亦曰三光。日月五星谓之七曜。天河谓之天汉。(《初学记》卷一“天部上”,第1页)

《纂要》云:嵩泰衡华恒,谓之五岳。江河淮济,谓之四渎。上中下,谓之三壤。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为五土。(《初学记》卷五“地理”,第88页)

颜延之诗文中不乏这些内容的铺排,如“五_五方_五率_五职,四_四隩_四入_四贡”(《赭白马赋》^⑭)、“六_六典_六联_六事,九_九官_九列_九序”(《宋郊祀歌》)。这种写法追蹑西晋雅颂体,“晋人四言,首章意取阔大,体自如此”。^⑮将《纂要》中“五岳”“四渎”“二仪”“三才”这类词汇连缀起来,几乎就是晋人颂体诗,如傅玄《答程晓诗》起首四句:“奕奕_二两_二仪_二,昭昭_二太阳_二。四_四气_四代_四升_四,三_三朝_三受_三祥。”陆云《赠顾尚书诗》:“五_五岳_五降_五神_五,四_四渎_四炳_四灵_四。两_二仪_二钧_二陶_二,参_三和_三大成。”可见这类字词选用与典正诗风的关系。

《纂要》这类撰述,本身就是文士储备小学知识并加以组织整理的书面呈现。^⑯搜罗同一义类的词汇,并在义类之中辨析词义,可以扩充创作时选词的范围,避免贫于一字;也有助于用词精准,以便附物

切情。更进一步说,不同文体的写作、不同文风的呈现,都可以通过简择字词来实现。后世这类撰述愈加滋繁,梁元帝曾经增广《纂要》,沈约《珠丛》、庾肩吾《采璧》、朱澹远《语对》《语丽》也都是同类著作。

总的来说,音义训诂施于诗赋文章,有助于疏通前代作品中的字词,减少文学阅读中的阻碍;文士参与小学书的创作,有助于将小学知识融会于心,更好地服务于文学创作。音义训诂之学的兴盛,为晋宋之际文士接续汉魏西晋的创作传统,从语言文字层面对文学进行变革做好了学术准备。

三、贯练雅颂,总阅音义:以谢灵运诗赋用字为中心

晋宋之际文士是时代学风的预流者,他们不仅参与了音义注释和小学著述的撰作,重视音义训诂的意识也渗透进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谢灵运是晋宋之际文学变革的枢纽人物之一。他与颜延之都以锻炼文字著称,^②二人的创作堪称南朝文学的“起点”,指引着南朝文学的发展方向,并以“典范”的意义影响着后来者的创作。本节试以谢灵运为个案,分析东晋后期以来音义训诂之学的兴盛如何影响了文士创作中的用字,以期为晋宋之际文学语言风貌的转变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中有不少关于赋中用字的说解,是可贵的作者自道,生动地展现了音义训诂之学如何影响了他在缀字属篇时的考量。

谢灵运用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经典文本中简选文字。如前节所引写鸟一段,自注称“鷓”出《左传》,“字如此”,这显示他关注的重心不是“鷓”这一种鸟的特性,而是“鷓”字源于经典。又如赋中“水草则萍藻蒹葭,藿蒲芹荈,兼菰苹蓂,蕤苳菱莲”句,自注:“鱼藻苹蓂苳亦有诗人之咏,不复具叙。”“沈滥异形,首毖终肥”一句,自注:“沈滥肥毖,皆是泉名,

事见于《诗》。”谢灵运写水草十六种,却只简单点出“藻”“苹”“蓂”“苳”四种出《诗经》,下文又只说“沈”“滥”“肥”“毖”四字是见于《诗经》的泉名,这说明谢灵运在自注中,最关注的与其说是山居中真实的物产,不如说是他典雅和繁博的用字。经书如《诗经》《左传》,都是他简选奇文的苑囿。

又赋中写荷花,有“必充给而后搴”一句,自注:“‘搴’,出《离骚》。”谢灵运好用“搴”字,其例又见“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郡东山望溟海诗》^③),“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石门岩上宿》),“憩石挹飞泉,攀林蹇落英”(《初去郡》)。“搴”即“拔取”义,《楚辞》中全用于拔取草木,如《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王逸注,“搴,取也”^④。“搴”又写作“撻”“撻”^⑤,字书多已指出其为楚方言词,如《方言》:“撻,取也。南楚曰撻。”^⑥《说文》:“撻,拔取也,南楚语。”^⑦“搴”《史记》中亦用,一见于骚体《瓠子歌》“搴长茝兮沉美玉”^⑧,另外三例都用于“斩将搴旗”的词组中。“搴”作为一个日常语言中并不常见的方言词,组合能力相当受限,只用于两个情况,一是《楚辞》系列的“拔取草木”,一是《史记》系列的“斩将搴旗”。从现存文献来看,东晋一代在诗文中沿用《楚辞》中“搴”字表示“拔取草木”义的,只有一首一尾的郭璞和谢灵运。^⑨由此可见,谢灵运用“搴”字,确是学习《楚辞》用字的炫技之处,故在《山居赋》自注中表出,希望读者注意其用心。

二是参考《尔雅》《说文》《字林》等小学书。这又可以分为用训诂和用字面两个层面。用故训,如《山居赋》总叙始宁山墅山川之美的一段中,有“山匪砮而是嵒”一句,谢灵运自注:“土山载石曰砮,山有林曰嵒”。关于“砮”和“嵒”的释义,《毛传》《尔雅》《说文》《释名》皆有,而《毛传》与《尔雅》不同,谢灵运采取的是《尔雅》郭璞注的解释。又“其木”一段,有“凌岗上而乔竦”一句,谢灵运自注:“山脊曰岗”。这一

训诂出自《尔雅·释山》，也见于《周南·卷耳》毛传和《大雅·公刘》郑玄笺。谢灵运用《尔雅》训诂并不仅见于此，《登江中孤屿诗》有“乱流趋孤屿”一句，^①李善注引《尔雅》“正绝流曰乱”为释。郭璞注称“直横渡也”^②，横渡意用“乱”字出之，本于《尔雅》故训。^③时代学风一变，东晋前中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④的逸事，已经成了过去。

用字面，如赋中“杨胜所拮，秋冬藟获”句，自注：“藟音覆，字出《字林》”；“野有蔓草，猎涉蓂蕝”句，自注“‘猎涉’字出《尔雅》”。又如赋中写鱼一段：

鱼则鰪鱮鲋鱖，鱣鲟鲑鳊，魴鲟魮鰽，鯉鯉鰪。

自注：鰪音优。鱮音礼。鲋音附。鱖音叙。鱣音寸衮反。鲟音皖。鲑音连。鳊音毖仙反。魴音房。鲟音痛。魮音沙。鰽音居缀反。鯉音上羊反。鰪音比之反。鰪音竹叵反。皆《说文》、《字林》音。

《尔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⑤，《说文》与《字林》也都是按部首分析字形之书，适于大赋中名物的联边铺排。自注称“字出《字林》”“字出《尔雅》”“皆《说文》《字林》音”，可知谢灵运在《山居赋》的创作过程中，大量参考字书和辞书，文字的音、形、义都在他的考量之中。

在《山居赋》自注揭示的情况之外，谢灵运喜用重言和联绵词的现象^⑥也与音义训诂之学相关。在谢灵运的时代，重言和联绵词在自然语言中有所衰落。重言和联绵词由音变构词产生，而音变构词在东汉就已经失去了活力，书面语中重言和联绵词的使用也大幅减少。^⑦因此，谢灵运以重言和联绵词模山范水、穷形尽相，并不单纯是一个遣词造句的“才”的问题，也关涉到作者在何种程度上谙熟文学传统、博通音义训诂，本质上是一个“学”的问题。如《泰山吟》：

岱宗秀维岳，崔嵬刺云天。岵嶮既嶮巖，触石辄

千眠。登封瘞崇坛，降禋藏肃然。石闾何唵藹，明堂秘灵篇。

黄节指出：“崔萃”，张衡《西京赋》有“隆崛崔萃”；“岵嶮”，张衡《吴都赋》有“虽有石林之岵嶮”；“嶮巖”，《楚辞·七谏》有“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芜秽而险巖”；“千眠”，《楚辞·九怀》有“远望兮千眠”，张衡《南都赋》用作“青冥盱睢”；“唵藹”，《楚辞·离骚》有“扬云霓之唵藹兮”。^⑧八句中使用联绵词五处，这些联绵词都曾见于《楚辞》和汉赋，无一处无来历。使用重言的例子略少于联绵词，如早年所作《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首二句：“草草眷物徂，契契矜岁殚”。“草草”，见于《小雅·巷伯》“劳人草草”；“契契”，见于《小雅·大东》“契契寤叹”。^⑨又如《登石门最高顶》：“活活夕流驶，噉噉猿猱啼。”“活活”见于《卫风·硕人》“北流活活”，“噉噉”见于《楚辞·九叹》“声噉噉以寂寥”。^⑩另外，谢灵运诗中一些通常被理解为“用典”的现象，侧重的也是语言层面，如吴元嘉分析指出，谢灵运山水诗引《诗经》典故整体倾向于“用词”而非“用事”^⑪。谢灵运诗文中的重言和联绵词多有渊源，这是谢灵运继承文学传统的结果，而他对经典文本中词汇的接受，又有得于重视音义训诂的时代学风。

从谢灵运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东晋后期以来重视音义训诂的时代学风如何影响了谢灵运的经典接受与诗赋写作。刘勰称汉时文学家兼通小学，都是“贯练雅颂，总阅音义”^⑫。谢灵运自如调用经典文本中的字词，将其化为诗赋写作的语言资源，正所谓“贯练雅颂”；利用小学书籍，分析音义训诂来简选文字，即是“总阅音义”。

结语

文字是文章的微观要素，研究文字音、形、义的“小学”，则是可以影响文学风貌的底层知识。从“用字”这一切入口来观察，可见小学与文学之间具体而

微的互动关系。

晋宋之际文学“体有因革”^②，“庄老告退”^③自然是这一变革的宏大背景，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纤微毫厘之间酝酿着的新风气。晋宋之际的一代文士，兼通小学与文学，在语言文字层面对东晋文学进行了变革。一方面是用字范围的扩大。所谓“酌《雅》以富言”^④，小学知识本身就可以用于翻新用字，扩充文学语言，“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⑤。而且，音义训诂之学有“津梁”之效，借助字词训诂，可以将前代经史文章中的字词重新激活，转化为诗赋创作时可供汲取的语言资源。另一方面是用字的精当准确。对文字音、形、义认识的深化，有助于创作者合理剪裁语言材料，探索最为恰切的字句安排，拓展文学语言的表达能力。

晋宋之际，颜谢都着意于用字，如方东树评价，“康乐无一字不稳老，无一字不典重，无一字不沉厚深密”，“颜诗全在用字密，典则楷式”。^⑥二人用字同样取法经籍、利用故训，崇尚典雅密丽，以致文风生涩，这些相似之处，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元嘉体形成的重要原因。在时代风格的差异之外，用字上的不同偏好也会导向作家个人风格的差异。颜延之经纶文雅，用词端庄整饬，有错采镂金之华美；谢灵运模山范水，属意于宛转附物的重言和联绵词，成芙蓉出水之秀逸。颜谢在时代学风影响下，对小学知识各有师心运化，故而文风同中有异。可见特定文学语言风貌的形成，既需小学知识的参与，也受文学审美的制约。

汉魏六朝时期，音义训诂之学逐渐发展，有关文字音、形、义的分析日趋精密，文士对语言文字的认识理解也不断深化。语言文字层面的变革，成为文学不断发展革新的重要路径。不独晋宋之际的文学变革涉及语言风貌的转变，齐梁文学对刘宋的革新

也与用字的变化密切相关。^⑦沈约主张“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⑧的“三易”之说，意在反拨刘宋文风的典重、僻涩。^⑨“三易”同样需要小学造詣的支撑，因为这并非追求平庸，而是利用寻常字词写出自然鲜活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达。何况永明文士以声病律文，对字音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至于王筠读沈约《郊居赋》至“雌霓连蹇”，读“霓”为“五激反”，沈约欣然抚掌，许为“知音”^⑩——这则文人逸事，生动地昭示着文章用字将要进入一个审音的时代了。

注释：

①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3页。

②④沈约：《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1778—1779页。

③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62页。

⑤⑥詹鍈：《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8、1250页。

⑦根据研究侧重的不同，“小学”可分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分支；古书又有“音义”一类，可以视为“小学”的应用。本文将东晋刘宋时期的语言文字研究概称为“音义训诂之学”，以反映这一时期小学偏重训诂，音义类注释尤为繁荣的特色。在具体涉及著述形式时，则依据中古目录书的著录，明确区分“小学”与“音义”两类。

⑧唐长孺：《东晋南朝的学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204页；《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第325页。

⑨本文从学术主体的代际更迭角度，将太元元年(376年)视为东晋后期的起始。

⑩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⑪书名卷数皆依《隋书·经籍志》，下文同此者不另出注。

⑫所谓“背隐义”，可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⑬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〇五,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981页。

⑭隋志著录为两种:“《庄子音》三卷,徐邈撰”和“《庄子集音》三卷,徐邈撰”,见魏征:《隋书》卷二九《经籍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001页;《经典释文·叙录》仅称“徐邈《音》三卷”,见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⑮胡宝国:《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文史》2013年第2辑。

⑯⑰房玄龄:《晋书》卷八三《车胤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77—2178、2177页。

⑱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言语》,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页。

⑲房玄龄:《晋书》卷七九《谢石传》,第2088页。

⑳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2009年第4辑。

㉑沈约:《宋书》卷五五《臧焘传》,第1543页。

㉒沈约:《宋书》卷五五《徐广传》,第1548页。

㉓胡宝国:《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文史》2013年第2辑。

㉔⑳房玄龄:《晋书》卷九一《徐邈传》,第2356、2356页。

㉕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第220页。

㉖“据统计,他收录徐邈(344—397)的音读最多,在二千条以上,刘昌宗、郑玄都近千条。”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第161页。

㉗裴骀:《史记集解序》,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4页。

㉘这一时期又有谢灵运撰《十四音训叙》,不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梵文声韵。相关研究参见王邦维:《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傅杰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66—1980页。

㉙沈约:《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第1711页。马国翰辑本序称:“此书括综《仓》《雅》,纂取异训,张揖《广雅》类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六二《纂文》序,清光绪九年(1883年)长沙嫫嬛馆本。从辑佚来看,《纂文》“收录了大量的方言词、名物词、口语词以及中古时期产生的一些新词新义”,

冯舒冉:《何承天〈纂文〉考论》,《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㉚详后。

㉛《隋书·经籍志》题为《诂幼》,其他文献中又有题作“诂幼”者。从辑得条目看,“无一不为训诂、音切之文”,是发蒙一类的训诂书。参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100页。

㉜⑳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詹鍈:《文心雕龙义证》,第1453、1453、1451、1454、1455、1455、1455、1456页。

㊿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4页。

①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

②黄伯思:《校定〈楚辞〉序》,《东观余论》卷下,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③汤洪:《汉代楚辞诵读考论》,《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④胡小石:《〈楚辞〉郭注义征》,《胡小石文史论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⑤《隋书·经籍志》有《兼中书舍人褚诠之集》,根据《隋志》集部别集类著录体例,褚诠之在颜延之之前,应该也是宋初人物。

⑥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20页。

⑦此据《文选》集注本。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第二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050—1054页。

⑧沈约:《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第1754—1773页。下文所引《山居赋》同此,不再出注。

⑨⑩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第四册,2017年,第1968、1968页。

⑪姚思廉:《梁书》卷五〇《刘杳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15页。

⑫魏征:《隋书》卷七六《潘徽传》,第1745页。

⑬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2005年,第128页。

⑭刘昉:《旧唐书》卷四六《经籍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7页。

⑮《初学记》引《纂要》,有径题“《纂要》”与题作“梁元帝

